

# 日本诺奖“井喷”对我国的启示

2016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12月10日举行。自今年诺奖科学奖评审结果揭晓后,日本已有22人荣获诺贝尔科学奖(含两名日裔美籍物理学奖得主)。在迈入21世纪的最初17年里,日本平均每年都有1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仅次于美国,令国际社会惊叹不已。

日本出现的如此诺奖“井喷”现象,究竟对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有何启示?

**启示一:有必要像日本大学那样设立荣誉教授称号**

进入新世纪之后,诺贝尔科学奖得主获奖时的平均年龄已超过65岁,日本诺奖得主获奖时的平均年龄甚至高达68岁。绝大多数科研人员年满65岁之后都会进入退休状态。然而,退休并不意味着不再参加学术交流活动。问题是退休后仍继续以退休前的学术头衔参加社会活动很容易引起误解。因此,日本大学特地设立荣誉教授称号以解决这一问题。

“荣誉教授”称号属于终身性质,不附带任何物质利益。只要在退休前没有违反师德和科学研究伦理规范,而且取得了不俗的科学研究成果,都可以获颁“荣誉教授”称号。这无疑有助于激励教学研究人员在职期间严于律己、努力进取,也会为德高望重的教学科研人员退休后发挥余热提供便利。

**启示二:晋升正高级职称时平均年龄最好在45岁左右**

日本新世纪17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晋升正高级职称时的平均年龄为43.35岁。业绩不是十分突出的研究人员晋升正高级职称时的年龄通常都会高于这些诺贝尔奖得主。

而在我国,一些高校出于留住或争抢人才的需要,竞相破格提拔教授,以致在二三十岁就被提拔为教授的比比皆是,一批年轻教授挤进了高收入阶层。这不仅会导致一些年轻精英在晋升教授之后很快失去在科研领域继续奋斗的动

力,而且还会导致很多年轻学者急于求成、躁动不安,甚至为了快速晋级而不择手段。此外,降低职称晋级平均年龄之后,不仅使教授队伍鱼龙混杂,而且还使政府无法“富养”教授。“穷养”教授的结果是,大批有志于在科研领域有所作为的教授因无法维持住自己的尊严,而对科研灰心丧气。糟糕的是,这种态度还会给年轻学者和青年学生造成不良的示范。中国有必要像日本那样将晋升正高级职称时的平均年龄控制在45岁左右。

**启示三:科研资源分配应向40岁左右的年轻学者倾斜**

日本新世纪17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取得获奖奠基性成果的平均年龄为40岁。在日本,这个岁数的科研人员大都是副教授。重要的是,副教授在日本可以像教授一样申报科研项目 and 招收博士生,加上40岁前后正处于创造力高峰期,因此他们完全可以做出丝毫不逊于教授的科研业绩。



在我国,以40岁作为年龄上限的科研项目仍属于稀缺资源。大量的科研经费仍然掌握在50岁以上的“大腕”们手中。而且,副教授招收博士生时,不仅会遇到博士生导师资格问题,而且还会受到博士生招生指标的限制。虽然处于创造力高峰期,但由于既缺钱,又缺人,所以很难做出具有高冲击力的科研业绩。欲改变这种状况,有必要借鉴日本的做法,将科研资源的分配向40岁左右处于创造力高峰期的年轻学者倾斜。

《科技日报》2016.12.5文/周程

## “中等收入”标准需要精准界定

不久前,国务院发布《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不断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各地正陆续出台相关办法,落实这一要求。

不过,目前国内学界对于中等收入者的概念界定,还未形成明确说法,中等收入者的具体划分方法也存在许多争论,无法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量化目标和具体化的政策方案。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中等收入群体划分方法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绝对标准模式,另一种是相对标准模式。绝对标准模式是基于维持相应生活水平所需要的收

入多少,来设定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标准。被广泛采用的绝对标准模式以世界银行贫困线(日人均收入1.9美元)为参照系,提出日人均收入介于10至50美元或10至100美元的人为中等收入者。相对标准模式通常是根据收入分布的中位数来确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收入中位数的50%或75%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下限,收入中位数的1.5倍或2倍为上限。

绝对标准模式主要反映的是达到一定生活水平(或收入水平)的人数及比例的增长趋势,比较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相对标准模式是测量收入处于中间位置的人数比例增减情况,主要反映

的是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比较适用于发达国家和高收入国家。

我国在3年前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正在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既要使越来越多的人脱贫致富,又要追求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绝对标准模式和相对标准模式的中等收入群体测量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在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之下,中等收入群体并不是同一群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一政策目标的重点,应该放在哪个群体,或者如何使两者达到平衡,是政策制定者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人民日报》2016.12.7文/李春玲

近期多名网约车司机反映,有乘客下车后不结账,手机号失联,最后只能自认倒霉。这些别有用心占便宜的乘客,用的多为手机临时号。

## 别让“手机小号”成违法行为帮凶

所谓手机临时号,又被称为手机“小号”,就是在不更换手机卡、不改变原来手机号码的情况下,向通信运营商或网络服务商申请购买一个新的手机号码,和原来的号码一起使用。“小号”一样可以拨打电话、接发短信。

运营商之所以推出“小号”服务,主要是为了帮助客户保护个人信息隐私,避免各种短信、电话骚扰。比如,当有人要租房子、找保姆时,需要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房屋中介、家政公司,如果留的是手机主号,既容易造成个人信息泄露,也可能在自己不需要租房、家政服务时,没完没了接到中介和家政公司的电话。

如果客户留的是自己的手机临时号,就可以在租房或聘请保姆后,对该号进行设置,以避免短信或电话骚扰。由此可见,手机临时号的存在,确实在保障公民个人隐私,避免短信和电话骚扰方面,有独特的价值。而且因为价格低廉,申请便利,可以常换常新,深受部分消费者的欢迎。

然而,手机小号让一些人看到了可乘之机。比如,有人故意用它来注册网约车,下车后不结账,然后失联。因为申请一个手机小号只要几块钱,相比少则几十,多则上百的网约车费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再比如,有人用它报复与自己有纠纷或有矛盾的人,频频用手机小号发送侮辱信息,或拨打骚扰电话,但受害人回拨回去,却显示网络忙或空号,让人无比气愤又无可奈何。

对此,电信运营商要负起监管责任来。“小号”是附着于“大号”存在的,也相当于实名,因此对于那些出现异常,或者接到投诉的“小号”,运营商要及时处理;受害人也要有点较真精神,不能因为损失小、怕麻烦,就纵容这种行为。比如在自身利益受损后,可以联系运营商找到“小号”背后的真实用户讨个说法,也可以拿起法律武器维权。

《京华时报》2016.12.7文/苑广阔

倡导绿色出行的共享单车近期在一些城市因占道被收走,引起公众热议。舆论认为,在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期释放新需求、培育新动能的背景下,政府部门需要在管理上创新思维,努力扭转“一刀切”的管理方式。政府部门可以沿着深化“放管服”的思路,去探索更有利保护、激励创新的做法。

## 服务创新性行业 呼唤包容性监管

“放”的重点在于找准政府、市场之间的边界,难点是政府怎样补缺位。共享单车的遭遇说明,倡导绿色出行的同时,一些城市却对支持绿色出行缺乏准备,公共配套设施建设不足、规划不合理。最理想的状态是政府在“放”之前先梳理一下有哪些缺位要补,避免穿新鞋走老路。

“管”的方向是适应“双创”新环境,难点是如何不越位。要让类似共享单车这样的创新行业充分发展,需要政府部门采取兼顾差异、松紧适度的“包容性监管”。

政府如果管得过严过死,则容易形成“弹簧门”“玻璃门”,放了等于没放。有时甚至会被解读为政府对某个行业“准入不准营”,不仅不利于鼓励创业创新,反而会影响政策公信力。

“服务”是在“放”与“管”的基础上,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重在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动社会创业创新,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在释放新需求、培育新动能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对创新行业的服务尤须跟上。

全面深化改革首先是政府的自我革新,政府部门要坚决摒弃旧的管理思维,努力适应新的“双创”环境。

新华社2016.12.7文/陈健

## “破解抗艾神药”不宜过度解读

最近,有一则消息《几个中国熊孩子意外破解抗艾神药,让垄断市场的“奸商”哭晕在厕所!》在流传。达拉匹林是一种专门治疗寄生虫感染的药,针对的是患有艾滋病、疟疾、癌症、妊娠综合症等免疫系统缺陷的病人。马丁·什克雷利花5000万美元买下了达拉匹林的所有权,然后将每片的价格从13.5美元涨到了750美元,一年就赚了几亿美元,让许多病人吃不起药。一群悉尼文法学校的高中生,其中包括数名华裔学生,决心对抗这个“全世界最遭恨的人”。在学校化学老师、开源数据库管理者、悉尼大学化学家等人的帮助下,他们终于成功合成了非常纯净的达拉匹林。他们合成出来的3.7克药物的成本不到20美元,而在美国这些重量的价格高达11万美元。

按照文章的说法:“澳洲的权威专家教授们被几个十五六岁的孩子给震惊了……一群高中生竟然让世界最著名的医药公司垄断成空、颜面扫地!”许多人在评论中盛赞这些高中生,还引申到“中国教育的弊端”,脑补“这些人如果在中国肯定做不成”。

多么感人的故事!——唯一的问题在于,这个故事的逻辑根本是忽悠。

这些高中生做到的是什么?是合成出达拉匹林中的有效成分。这很困难吗?其实一点都不难,这种物质的结构很简单,两三步化学反应就能合成。在导师的适当指导下,任何高中生都能搞定。为什么其他人不做呢?因为有专利和批准的问题。你可以制造这种物质,但不能拿去卖。

此外还有一些细节。达拉匹林不是治疗艾滋病的,只是辅助治疗。把有效成分做出来只是制药的前期,从有效成

分到成药叫做“制剂”。很多时候,有效成分在人体内不能被溶解或吸收。我们看到的药片都有许多添加物,使有效成分被人体吸收,才能起到药效。药剂量也很有讲究,过多会有副作用。这又需要临床研究者,只有通过临床试验才能确定多大的剂量是有效并相对安全的。还有重要的一环,是从实验室合成到大批量生产,并控制高质量,即“工艺化学”。

总之,这些高中生做的只在学习和实验的角度有一定的意义,其他的纯属过度解读。近年来,这样的炒作频频出现。例如《这个姑娘发明了一本可以喝的,改变了6.63亿人的命运》,宣称用含纳米银的滤纸做的书可以净水,拯救全世界几亿缺乏干净水源的人口。

这类“小清新”文章的共同特点是,都诱导读者向以下方向联想:不需要正规的科研条件,脑洞一开就能做出大成果;外国人关心公益,不像中国人麻木不仁;外国的教育生机勃勃,中国的教育扼杀创造力……这种宣传是让人用哈哈镜看世界,打着科学的名头,传播的却都是伪科学精神。许多人不懂科学,只有廉价的“情怀”,充满“轻轻松松改变世界”的幻想,在他们眼里科学跟魔法没有什么区别,这种文章迎合的就是他们的需求。

根据调查,我国具有科学素质的人口比例逐年增长。但是真正懂得科学精神包括质疑、证明、实验等基本元素,能够把科学精神运用在实践中的人,恐怕比例要低得多。在这方面,我国的科普工作者和公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环球时报》2016.12.10文/袁岚峰